

卢沟桥没有忘记

■ 剑 钧



感念

12年前,我为了创作长篇纪实文学《守桥翁的中国梦》(中国青年出版社2014年9月出版),一连数月跟踪采访了抗日战争史学家、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首任筹建处主任郭景兴先生。他告诉我,为了真实还原“卢沟桥事变”那段可歌可泣的抗战历史,他和夫人蒋亚娴自20世纪80年代起,几乎跑遍了大半个中国去采访当事人。这期间,郭景兴有了惊人发现。先前人们大多认为第29军在卢沟桥奋起抗战是抗日爱国将领的壮举,却很少注意到这样的史实——在抗击日寇的西北军和第29军中,活跃着中共地下党组织和一批战斗在隐蔽战线的共产党员。卢沟桥保卫战中,第29军驻守回龙庙的英雄排长沈忠明早在1936年就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。他以一个排的兵力抵御十倍敌人的进攻,直到身负重伤,光荣殉国。

郭景兴说:“我原来只知道在当时抗击日寇的西北军和第29军中,有很多的地下共产党员。没想承,后来第29军将领尹心田之子尹家衡同志寄给我一篇文章,文章中介绍初期这两军有中共地下党员70余人。接着我又读到王沛南、尹心田、周茂兰合著的文章《汾阳军校中党的地下活动》,得知汾阳军校,就是第29军第2教导团,那时全团已有中共地下党员80余人。可想而知,当时这些优秀的地下共产党员,在抗击日寇的斗争中发挥了多么重要的作用。更令人敬佩的是,他们战斗在特殊环境中,危机四伏,随时都有生命危险,却坚韧机智地坚守在党委派的岗位上。正因为如此,10年后的淮海战役,才出现了张克侠、何基沣两位地下党员,率领国民党军两万三千多人的阵前起义,创造

了‘一夜变千秋’的壮举。”

郭景兴夫妇按照这些线索,走访了许多第29军的老地下党员,还原了历史的真相。“我印象最深的要算采访原南京海军指挥学院院长朱军同志了。”郭景兴说,“朱军同志,原名朱大鹏,1927年参加中国共产党,1933年到抗日同盟军,从第29军军训团成立到1939年进行改编,他始终在军训团内任职,后来转到延安工作。我们1983年到南京采访时,他已从南京海军指挥学院院长职务上离休。朱老对这次访问十分热情,为我们详细介绍了第29军军训团从成立到改编的全部经过,还重点讲了军训团内我党地下组织情况,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珍贵史料。”

谈起第29军军训团中党的地下组织规模,还要从抗日同盟军的地下党说起。1933年5月长城抗战之后,冯玉祥、吉鸿昌、方振武等在张家口建立了抗日同盟军,又称察绥抗日同盟军。当时,抗日同盟军中的地下党组织由中共河北省委领导,省委前委书记是张木陶。中共北方局委派朱大鹏(即朱军)到抗日同盟军开展党的地下工作。朱军时任抗日同盟军一团一营的党支部书记,其他成员有宣传委员蒋明成、组织委员王绍武、排长张文周等,共计30多位党员。根据朱军的回忆,在抗日同盟军中,党的地下组织主要领导有:“同盟军”二师(汾阳军校)师长支应遵、一团尹心田、二团贾振中、三团周茂兰(即周树一)等;五师师长也是地下党员,陕西人,姓名不详。由于抗日同盟军的抗日救亡主张,违背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意志,蒋介石一开始就阻挠破坏,继而武力镇压。日军也同时向察哈尔省调遣。同年8月5日,冯玉祥在蒋军及日军的双重压迫下,通电结束抗日军事行动,取消同盟军总部,离开张家口。吉鸿昌、方振武等按照中共河北省委的

决定,将队伍转移至北平,由方振武担任总司令(后改称讨贼联军)。朱军同志离开抗日同盟军后,于1934年春节前来到天津市警察局,为北方局做情报工作。当时,他的身份是天津市警察局策反侦缉队队长。过了一段时间,经党组织安排,在第29军任职的地下党员冯洪国(冯玉祥之子)又向冬麟阁推荐朱军到第29军军训团工作。1937年1月,军训团成立后,朱军任第三大队副队长。当时,军训团里的党员有冯洪国、蒋明成、范菊秋等,加上朱军共6人。朱军把其他5人组织起来建立了党支部,他任支部书记,蒋明成任组织委员。不久,他们又与上级党组织接上了关系。上级党组织的领导是谢甫生、王世英两位同志。

七七事变后,朱军随军训团到济南,又招收了40多名新学员,大部分是济南师范学校的学生,其中亦有不少党员。如陈克、李天民、吴棣等。军训团开到郑州,成立了新生队,朱军兼队长,并建立了党支部,发展了多位党员。然后把他们陆续分到军训团各中队。以后李天民担任支部书记,与朱军单线联系,朱军再与特委联系。后来,李天民到新四军挺进队后,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了。

郭景兴告诉我,1931年宋哲元任第29军军长时,1929年入党的地下党员张克侠就在第29军38师(师长张自忠)任参谋长。1937年至1945年抗日战争时期,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。第29军中的地下党员数量猛增。1938年第29军改编为33集团军时,张克侠升任参谋长。同为地下党员的过家芳已任第179师副师长、军训团团长。1939年入党的何基沣同志任第179师师长、第77军军长。他们身居国民党军中要职,一方面指挥抗战杀敌,一方面积极发挥地下党员在抗战中的作用。

回顾1924年冯玉祥建立国民军,

易木桥很快搭建好了。桥面上铺满乡亲们主动捐献的门板、床板,甚至还有老人留用的棺材板。

由于河水湍急,搭建好的木桥并不牢固,大部队过桥仍存在安全隐患。为了保证红军顺利过河,参与建桥的青壮年又纷纷跳入水中,用身体护住桥墩,用手加固桥板;岸边,乡亲们拿来红薯、鸡蛋等,送给远征的红军。

这座连接着人民子弟兵与群众生死命运的“连心桥”,早已消失在历史的风风雨雨之中,取而代之的是在它不远处建起的一座雄伟壮观的钢筋水泥大桥。桥头立着一块“红军长征第一桥”纪念碑,永久镌刻在这里发生的故事。

红军当年渡河的渡口还在,那棵见证历史的老樟树还在。在当地朋友的陪同下,我来到渡口,望着眼前奔腾的绵江水,耳畔似有《十送红军》的歌声回响:“一送(里格)红军(介支个)下了山,秋风(里格)细雨(介支个)缠绵绵。山上(里格)野鹿声声哀号,树树(里格)梧桐叶叶落完,问一声亲人红军啊,几时(里格)人马(介支个)再回山……”歌声里似有悲伤,但更饱含着深情。在这片洒满烈士鲜血的土地上,有太多催人泪下的故事;在历史与现实的连接中,有太多让人难以忘怀的桥——武阳镇的木桥、于都河的浮桥、沂蒙山六姐妹用身体架起的“人桥”、渡江战役千万船工组成的“船桥”……那是一座座连心桥、胜利桥,更是永生的桥——在历史中永生,在人们心中永生。这一座座记忆中的桥,生动诠释着“江山就是人民,人民就是江山”的深刻内涵,连接着过去、现在和未来。

由于旧的木桥基础太差了,经区干部与部队领导商议,决定在离旧桥约50米处的下游重建一座新桥。新建桥最关键、最紧张的是打桥墩。由于水流湍急,水中央站立不稳,乡亲们便互相配合,有的举榔头,有的扶木桩,在选好的位置,将削尖的木桩打入河床之中,再搬来石头围桩加固,用棕绳绑牢固。每打一个桩,都要付出艰辛的劳动,有的人被水冲倒,被人扶起来后,又继续投入打桩的战斗。

10月的赣南,天气已经转凉,早晚河水更是寒冷。打桩的乡亲们在河里一站就是几个小时。手上磨出了血泡,河水的寒意沁入骨髓,但没人叫苦叫累,更没有人临阵退缩,有的只是激昂的打桩声和劳动号子声:“红军要渡河,架桥理应当。脚下要站稳,心里不要慌。两眼看木桩,一锤一锤夯。搭好红军桥,一起上前方。”经过军民的连续奋战,一座简

易木桥很快搭建好了。桥面上铺满乡亲们主动捐献的门板、床板,甚至还有老人留用的棺材板。

由于河水湍急,搭建好的木桥并不牢固,大部队过桥仍存在安全隐患。为了保证红军顺利过河,参与建桥的青壮年又纷纷跳入水中,用身体护住桥墩,用手加固桥板;岸边,乡亲们拿来红薯、鸡蛋等,送给远征的红军。

这座连接着人民子弟兵与群众生死命运的“连心桥”,早已消失在历史的风风雨雨之中,取而代之的是在它不远处建起的一座雄伟壮观的钢筋水泥大桥。桥头立着一块“红军长征第一桥”纪念碑,永久镌刻在这里发生的故事。

红军当年渡河的渡口还在,那棵见证历史的老樟树还在。在当地朋友的陪同下,我来到渡口,望着眼前奔腾的绵江水,耳畔